

宋代北方青瓷体系形成中的耀州窑因素

刘祥辉

摘要:宋代北方青瓷体系的形成,并非耀州窑单向扩散,而是在耀州窑、临汝窑、汝窑及河南中西部相关窑场互动中逐步生成。耀州窑作为五代至北宋北方青瓷的重要窑场,在技术成熟、装烧制度与装饰风格定型等方面具有关键作用,推动北方青瓷由多品类烧造走向相对稳定的体系,并在区域层面促进技术与风格的传播与整合,是理解宋代北方青瓷体系形成的关键环节。

关键词:耀州窑;北方青瓷;宋代陶瓷;技术传播;窑业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耀州窑是宋代北方青瓷研究中的核心窑场。以陕西铜川黄堡镇窑址为中心,耀州窑自唐代创烧,经五代发展,至北宋进入成熟与繁荣阶段,形成了以青瓷为主体、以刻花和印花装饰为特色的产品面貌。长期以来,学界围绕耀州窑窑址考古、器物分期、胎釉特征、装饰风格、生产工艺及名窑地位等问题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为认识耀州窑自身发展脉络奠定了坚实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既有研究多从耀州窑内部认识耀州窑,而对其在宋代北方青瓷整体格局中的位置与作用,尤其是与临汝窑、汝窑及河南中西部相关青瓷窑场之间的技术联系、风格互动和区域整合关系关注不足。耀州窑的发展不仅是陕西区域陶瓷史中的重要现象,也与五代至北宋以来北方青瓷生产重心的形成、技术传播路径的展开以及不同窑场之间的风格互动密切相关。因此,若要深入理解宋代北方青瓷的发展,不能仅考察耀州窑自身的器物演变和工艺特征,还应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区域窑业结构中加以观察。本文所说的“宋代北方青瓷体系”,并不是指某一单一窑场,也不等同于“耀州窑系”,而是指以耀州窑、临汝窑、汝窑及河南中西部相关青瓷窑场为主体,在技术、器类、装饰、生产和流通等方面逐渐形成的区域性窑业结构。

因此,将耀州窑放在宋代北方青瓷体系形成的视野中考察,不是追问“耀州窑是否影响了其他窑口”这一问题,而是要分析耀州窑究竟以何种方式参与了这一体系的生成。本文所称“耀州窑因素”,主要指耀州窑在青瓷技术成熟、装烧制度改进、装饰风格定型、生产组织发展和区域传播等方面,对宋代北方青瓷格局产生的作用。围绕这一问题,本文拟重点讨论三个方面:其一,耀州窑青瓷技术的成熟如何为北方青瓷体系形成提供基础;其二,耀州窑装饰风格和器物样式如何参与宋代北方青瓷视觉面貌的塑造;其三,耀州窑与临汝窑、汝窑及河南中西部相关窑场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推动北方青瓷由单一窑场发展走向区域性窑业结构。通过上述分析,进而揭示耀州窑在宋代北方青瓷体系形成中的节点作用及其历史意义。

二、耀州窑与北方青瓷体系形成的工艺基础

宋代北方青瓷体系的形成,首先以青瓷技术的逐步成熟为前提。耀州窑自唐代创烧以来,其生产面貌经历了较为明显的阶段性转变,由多品类并行的综合性窑业形态,逐渐向以青瓷生产为主导的方向收敛。唐代遗存所见产品类型较为复杂,除青瓷外,还包括黑瓷、白瓷、茶叶末釉瓷、三彩及其他釉陶制品,反映出北方窑业在早期阶段尚未形成稳定的单一产品结构。至五代时期,这一局面开始发生变化,青瓷烧造质量明显提升,器物造型、釉色控制、装烧方式及器类组合逐渐趋于稳定。尤其是青瓷在产品结构中的比重上升,说明耀州窑已不再只是延续唐代多品类烧造的地方窑场,而是在新的技术选择 and 市场需求中逐步确立了自身的发展方向。这一转变为北宋时期耀州窑青瓷体系的成熟奠定了基础,也使其在北方青瓷发展序列中呈现出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

这一技术演进的核心动力之一,来自对异地窑业传统的吸收与再组织。晚唐五代以来,越窑青瓷在器形设计、釉色控制与装烧技术等方面具有广泛影响,耀州窑在发展过程中明显吸收了相关经验,但这种吸收并非简单移植,而是在本地原料条件、窑炉结构与北方消费需求约束下的地方化转化。南方青瓷技术进入北方后,需要在原料选择、胎釉配比、窑炉气氛及装烧方式等方面进行系统调整,才能逐步转化为适应本地生产条件的工艺体系,这一过程体现出耀州窑较强的技术整合能力与地方再创造能力。从具体工艺环节看,装烧制度的改进尤为关键,匣钵、垫烧与支烧等技术的逐步完善,使窑内烧成环境得到更稳定控制,在提高成品率与改善釉面质量方面发挥了直接作用,从而推动青瓷生产由经验性操作转向相对系统化的工艺组织,其整体技术结构也因此呈现出更为成熟的一体化特征。

从北方青瓷体系形成的整体视角看,耀州窑的技术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它推动北方青瓷由唐代多品类并存状态,逐渐转向以青瓷为核心的相对稳定生产结构;其二,它通过窑具制度与烧成技术的成熟,为周边及相关青瓷窑场提供了可参照的工艺路径。因此,耀州窑在这一阶段所体现的,并不仅是单一窑场技术水平的提升,更是一种具有扩散意义的工艺基础性力量。耀州窑青瓷技术的成熟,不仅属于耀州窑自身发展史的问题,也构成宋代北方青瓷体系生成的重要技术前提。

三、耀州窑装饰传统与北方青瓷视觉面貌

技术成熟奠定了耀州窑参与宋代北方青瓷体系生成的工艺基础,而装饰传统则从视觉层面参与了北方青瓷风格面貌的塑造。耀州窑因素不仅表现在青釉烧造、窑具制度和装烧方式等技术层面,也表现在其通过刻花、划花、印花等装饰工艺所形成的视觉表达方式上。这种由青釉、器形、纹样、构图和刀法共同构成的装饰方式,构成了耀州窑青瓷最具识别度的风格特征。同时,也通过产品流通、工艺传播和区域窑场互动,对临汝窑、宜阳窑、宝丰窑、新安窑、禹县窑及河南中西部相关青瓷窑场的产品样式和视觉风格产生了影响。

耀州窑装饰传统的形成,首先体现在刻花、划花、印花等工艺的成熟运用,以及由此形成的稳定纹样程式和视觉风格。刻花、划花强调手工刀法和纹样层次,能够在青釉器表形成清晰的纹样轮廓、主次关系和装饰节奏;尤其进入北宋以后,耀州窑青瓷装饰在刻花、划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印花工艺,纹样类型和构图格式逐渐趋于固定,同类装饰能够较为稳定地重复出现,刻印花装饰由此成为其最具识别度的视觉特征之一。这一变化与产品数量增加、器物样式趋同和市场流通扩大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耀州窑青瓷装饰由较多依赖工匠刀法和手工经验,逐渐转向具有一定规范性和重复生产能力的样式化生产。这一转变使耀州窑装饰传统不再只是个别工匠的技艺表现,而成为可被识别、仿效和转化的区域性视觉资源。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耀州窑装饰风格获得了更强的识别度和传播力,并对宋代北方青瓷视觉面貌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装饰题材方面,耀州窑青瓷常见莲纹、牡丹纹、缠枝花卉、鱼纹、水波纹等母题。这些纹样大多承接唐以来较为成熟的器物装饰传统,并与佛教信仰、吉祥观念、世俗审美和日用器物需求有着密切联系。在耀州窑青瓷装饰系统中,它们并不是被简单移植到器物表面,而是通过刻花、划花、印花等工艺,被重新组织为适合青瓷器表表现的装饰程式。耀州窑工匠根据碗、盘、瓶、壶等不同器类的空

间结构,安排中心纹样、边饰纹样、缠枝构图和满地布局,使纹样、器形、釉色、构图和刀法之间形成较为稳定的组合关系。由此,耀州窑装饰传统不再只是若干纹样题材的集合,而是形成了一套以青釉为基础、以纹样为核心、以构图和刀法为支撑的青瓷视觉语言。这种视觉语言并未局限于耀州窑自身,而是通过产品流通、工艺传播和区域窑场互动,对临汝窑、宜阳窑、宝丰窑、新安窑、禹县窑等北方青瓷窑场产生了影响。这些窑场的部分青瓷产品,在器形、釉色、刻印花装饰、花卉纹样和构图方式等方面,与耀州窑青瓷存在不同程度的相似性,有些器物甚至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耀州类型”特征。

从北方青瓷体系形成的角度看,耀州窑装饰风格的意义,不在于某一种纹样是否被其他窑场完全照搬,而在于其成熟的装饰系统在区域窑业互动中产生了持续影响。临汝窑及河南中西部等北方青瓷窑场对耀州窑相关样式的吸收,并非完全照搬,而是在各自胎釉条件、生产习惯和消费需求基础上的选择性转化。正是在这种吸收与转化过程中,耀州窑以刻印花装饰为核心的视觉传统,突破了单一窑场的局部范围,成为宋代北方青瓷体系形成中具有代表性的视觉因素。它使北方青瓷在釉色之外,进一步形成了以刻印花工艺、典型题材和程式化构图为特征的区域性视觉面貌。

四、耀州窑与宋代北方青瓷窑场的区域互动

宋代北方青瓷体系的形成,不能仅从耀州窑自身的技术和风格演变来解释,还必须放在区域窑业互动中加以考察。五代至北宋时期,陕西、河南等地多个青瓷窑场相继发展,北方青瓷逐渐呈现出多中心、多层次并存的格局。在这一格局中,耀州窑、临汝窑、汝窑及河南中西部相关青瓷窑场之间,既存在技术、器类和装饰方面的联系,也存在生产目标、产品等级和审美取向上的差异。耀州窑成熟较早,产品数量较大,器类丰富,装饰风格鲜明,兼具民用属性、市场属性和较高工艺水准。临汝窑及河南相关青瓷窑场与耀州窑之间,在青釉产品、碗盘类器物、刻印花装饰和部分纹样题材方面存在可比较关系,部分产品也显示出对耀州窑装饰风格和器物样式的吸收与转化。汝窑则在北宋晚期发展出更高等级的天青釉审美和供御化生产方向,形成不同于耀州窑的风格系统。由此可见,宋代北方青瓷体系并不是单一风格的扩散,而是多个窑场在共同技术背景、不同生产条件和多样审美需求中形成的复合结构。

在宋代北方青瓷窑场之间的区域互动中,耀州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技术经验、产品样式和审美取向三个方面:首先是技术经验的传播。耀州窑在青釉烧造、窑具制度、装烧方式和刻印花工艺方面的成熟,为北方相关青瓷窑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工艺经验。其次是产品样式和装饰风格的影响。耀州窑青瓷在流通过程中,其器形、纹样和装饰方式可能成为其他窑场模仿、吸收和改造的对象。再次是区域审美趣味的塑造。耀州窑产品兼具实用性与装饰性,适应了宋代日用器物审美提升和市场需求扩大的趋势,推动北方青瓷在更广泛的消费空间中形成相近的风格取向。这一过程不仅表现为单向的技术传播或局部纹样的扩散,更重要的是在多窑场持续互动中逐步形成了一种具有共性基础而又存在地方差异的区域性青瓷风格格局。

因此,耀州窑与宋代北方青瓷体系之间的关系,既不是“中心决定边缘”的单线关系,也不是各窑场彼此孤立发展的并列关系,而是一种以技术交流、风格借鉴、产品流通和地方转化为主要内容的区域窑业关系。耀州窑以其较早成熟的青瓷技术、鲜明的装饰风格和较强的产品影响力,参与并推动了北方青瓷

由单一窑场发展走向区域性窑业结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窑场在吸收与再生产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相互关联的技术路径与风格谱系,北方青瓷也由此呈现出既有共同技术基础、又有地方风格差异的区域性窑业格局。

五、结语

宋代北方青瓷体系的形成,是五代至北宋时期北方窑业技术进步、审美转型和区域互动共同作用的结果,耀州窑在这一过程中具有突出的历史地位。从技术层面看,耀州窑在五代至北宋时期吸收越窑青瓷经验,改进窑具制度和装烧工艺,推动青瓷质量显著提升,为北方青瓷成熟提供了重要支撑。从装饰层面看,耀州窑以刻花、划花、印花为核心,形成具有鲜明辨识度的纹样系统和视觉风格,对宋代北方青瓷审美产生深远影响。从文化层面看,耀州窑将异地窑业传统、地方原料条件、宋代器用需求和时代审美趣味相结合,完成了南方青瓷技术的北方化转化。从区域层面看,耀州窑与临汝窑、汝窑及河南中西部相关青瓷窑场共同构成宋代北方青瓷体系的基本格局,其间既有技术传播和风格关联,也有生产层级和地方差异。

因此,耀州窑虽不是宋代北方青瓷体系的唯一源头,但却是这一体系形成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核心因素。它既是技术接受者,也是技术转化者;既是地方窑场,也是区域窑业系统中的关键节点;既体现了北方青瓷的工艺成熟,也塑造了宋代北方青瓷的视觉风格和文化面貌。通过耀州窑这一个案,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宋代北方青瓷体系形成的历史逻辑,即技术交流推动工艺成熟,风格分化塑造区域特色,多窑场互动促成体系生成。这也为重新认识耀州窑在中国陶瓷史中的地位,以及深化宋代北方区域窑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解释路径。由此可见,这种多层次的互动关系说明,耀州窑的历史价值不应仅从“窑口”意义上理解,更应从技术传播和区域体系形成的角度重新评价。它既反映了唐宋之际南北窑业技术交流的深度,也体现了北方地区在吸收外来经验基础上形成自身陶瓷传统的能力。

参考文献:

- [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铜川耀州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5.
- [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黄堡窑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 [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五代黄堡窑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 [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耀州窑博物馆.宋代耀州窑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 [5]耀州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铜川市考古研究所.立地坡·上店耀州窑址[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 [6]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 [7]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
- [8]冯先铭主编.中国古陶瓷图典[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 [9]郑建明.五代至北宋时期耀州窑青瓷分期再研究——以与越窑青瓷发展对比为中心[J].故宫博物院院刊,2024(8).
- [10]王星.耀州窑生产作坊再观察[J].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2).
- [1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 [12]秦大树.汝窑的考古资料释读及生产体制探讨[J].华夏考古,2020(3).